

視域、場域與轉向：近二十年來 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觀察與探索*

袁朝暉

[提 要]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呈現出曲折的螺旋發展軌跡。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者“內在意識”的覺醒——即不僅僅關注於具體的個案研究，而是在全球化視域下，從理論建構層面和實踐角度探尋屬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已成為每一個學者孜孜以求的學術目標。叩問與回應、理解與開拓、視域與轉向，共同構成了這二十多年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主題，值得我們回眸與沉思。

[關鍵詞] 中國基督教史 宗教中國化 研究範式

[中圖分類號] B97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2 - 0101 - 11

“我們的神學探索必須忠於聖經，忠於歷史教會的教導，也同祖國的新面貌相稱。……我們必須從我們自己的教會實際和社會實際出發，來演化出自己的思想和方針。”^①這是丁光訓留下的一段文字。這段話雖然是說給三自教會的，但對於中國基督宗教史——尤其是本文所關注的最近 20 年來的回顧與展望而言，也是振聳發聵，值得深思的。

一直以來，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不可謂沒有輝煌過，也不能說沒有筭路藍縷過，特別是在 21 世紀以來這短短 20 餘年的“翻騰”歷程中，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可謂經歷幾多風雨，幾番愁緒；有希望、有失落；有收穫、有遺憾；有光芒、有晦暗，這些情緒的氤氳往往還是“混雜”在一起的，讓人、事、文與思皆“五味雜陳”。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學界不僅僅關注具體的案例，也在全球化視域下探尋屬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核心要素，通過孜孜以求的“內在覺醒”開拓了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前沿領域。

一、視域：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支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才真正全面展開。不可否認，整體而言，在取得了一些成績的同時，學術研究的薄弱之處也不容忽視。譬如，在 1981~1990 年間發表的關於教會和傳教士的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宗教學理論的基本範疇研究”(項目號:22&ZD254)的階段性成果。

500 多篇論文中,反洋教鬥爭仍然是重頭戲,約有 300 多篇文章沿著兩個方向探討了這場延及半個多世紀的鬥爭,^②主要集中在教案的起因、性質和評價方面。

對於 21 世紀之前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而言,嘗試、選擇、回應構成了“尋路”的主題——這個問題時至今日仍然擺在每一個學者面前:什麼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支點?什麼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最核心的內核?什麼是真正屬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概念、範疇與體系?

在多學科日益交融的今天,若“剝離”了圍繞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的種種花環、外衣和裝飾——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還是“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的依據與唯一性在哪裡?即中國基督教史的邊界與內核何在?^③

筆者以為,忠於聖經(尊重信仰)、忠於教會的歷史(尊重歷史),忠於祖國的新面貌(尊重現實),這是對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支點的最好的描述與定位。

類似的,漢斯·昆(孔漢思,Hans Küng)認為,神學和教會的本土化需要建基於以下四個詮釋的前提之上:(1)復歸原始的符合聖經的信仰,而不是那些幾百年來在中國信徒中引發爭議的懺悔式的、西方教會的教條。“源自猶太教的基督教教義不需要傳統的希臘、羅馬、德意志或盎格魯撒克遜的外衣,它能夠也應該穿上中式服裝。”(2)要基於當代人民生活經驗和當代社會—政治環境,對原始基督教信仰作兼收並蓄的重新闡述。做真正的中國人和真正的基督徒並不是互相排斥的;(3)要注重實際的例子,不要囿於教條式的刻板的正統。個人和教會團體的實際經驗對今天世俗化了的中國社會有過並且依然有特殊的意義,“在中國,注重人民福利而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教會團體可以成為社會進步的酵母。”(4)通過宗教復興文化,中國化了的基督教自有其美學、道德和政治內涵,它可以為倫理、教育,為在民族和個人生存中發現並保持人的價值做出建設性的貢獻。以上這四個詮釋基督教神學的基礎,應該說是漢斯·昆深入觀察並總結西方教會在中國傳播及發展的經驗及教訓之後得出的。雖然這是他十幾年前的看法,但至今仍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④

在筆者看來,其論點似乎與丁光訓的觀點不謀而合,那就是:尊重信仰,尊重歷史,尊重現實——這才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真正需要做到的。

二、場域: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辯證統一

筆者認為,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應做到忠於聖經(尊重信仰)、忠於教會的歷史(尊重歷史),忠於祖國的新面貌(尊重現實)——這三者之間也是“三位一體”的:

首先,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必須是而且最重要的是基督宗教信仰與中國社會、文化和人的接觸、結合與發展,因之,理解基督宗教和其所“接觸”的歷史之中國的種種,就應當成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首要問題。

這其中,丁光訓還特別提出要把“基本信仰”(信仰)和“神學思想”(學術)適當地分開,值得研究者反復思考與警醒。他指出,把“基本信仰”(信仰)和“神學思想”(學術)適當地分開,是三自愛國運動從四十週年到五十週年這十年期間,中國教會在神學研究上的一個重大發展。這一發展使中國基督教既能保證持守純正的基本信仰,又能有活潑的思想和見證;既能有利於基督徒在共同基本信仰基礎上的團結,又能有有利於我們作出適應處境的見證。讓屬於學術的屬於學術,屬於信仰的歸於信仰,二者不矛盾,相互有別。^⑤

其次,基督宗教首先是一種宗教,一種思想,一種信仰體系,“但是研究者往往重視了基督教介紹的西方文化,卻忽視了對宗教文化的研究,因此也不能揭示基督教文化如何成為中國文化的新因

子。”^⑥這意味著,基督教研究需要凸顯人的主體性,並回歸信仰本身。

再次,對於任何學術研究者而言,總是立足現實“回眸”歷史、對歷史抱有“理解之同情”固然重要,但“理解”應包括三個條件:歷史資料、歷史場景與歷史哲學的建構。至於如何把歷史學、宗教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更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新趨勢。在這樣的理解邏輯下,信仰、歷史和現實構成了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三要素。這也是本文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近期呈現的一些轉向和努力進行評判的標準。

不研究基本的信仰問題——如後文中將要討論的聖經與中國社會研究的深入,基督教信仰思想如何傳入中國並生根、開枝、成長,宗教生活與中國社會的嵌合等等——就只是純粹的歷史研究,至多不過是文化史學或者社會史的範疇,而非宗教性的或宗教史的;

不研究教會的中國歷史——如我們會談及的中梵關係、區域發展等——就無法洞察和真正知曉中國基督教是如何成為現在的樣子,何以至此,也更無法為信仰之今日做出正確的答案,比如“在對基督教的研究中,往往以差會和傳教士為中心。實際上,基督教成為中國宗教,外國差會開了個頭,中國教徒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對中國教會人士的研究比較缺乏”。^⑦——就只能是充斥著非科學性的純粹的信仰辯護而非客觀的學術研究,更有可能霧裡看花,以訛傳訛;

不立足當下,不回應現狀,不正面現實,不借助今日學術成長與發展之果實而一味守舊抱殘,不以今日的基督宗教信仰與歷史研究來回應中國基督教當下之“疑問”——如後文將要討論的基督宗教中國化發展的新思考等——就“虛無”了歷史,“解構”了信仰,也真正讓基督宗教走向了時代的“對立面”,消解了基督教“為當代日益發展的中外文化交往、為中華文化的有容乃大、生生不息,提供歷史的觀照”^⑧的重要使命。

三、轉向: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探索意識

評判當下或較近時期的歷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對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尤為如此,所幸徐以驊、陶飛亞、楊衛華等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和討論。^⑨本文不擬重複前賢的高論,而是在他們提供豐富“給養”的基礎上,基於本文的邏輯定位——尊重信仰、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筆者將就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二十一世紀,尤其是近年來的轉向與發展做出一番描述。^⑩且地理區位上僅限於大陸學者,不涉及港台及海外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人士。文本選擇也非面面俱到,而是基於前述邏輯體系,主要選取近 20 年在筆者看來比較有新意、創見和開拓性的部分著述,雖難免掛一漏萬,但也希望嘗試進行學科史的“在場建構”。尤其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勾勒的“轉向”中的書稿很多尚未出版或未有中文譯本;本文中陳述的某些看法,也是筆者在多年工作實踐中與學者們交流的所想、所感、所得,雖未一一列出姓名,誠不敢掠美。

(一) 尊重信仰

1. 聖經與中國的理論探討

聖經研究在西方學術研究領域佔有十分顯赫的位置。而與中國的相遇、交融與深入也一直是學者研究的重中之重。根據筆者的立論,即基督宗教信仰與中國社會、文化和人的接觸、結合與發展,河南大學文學院程小娟的《God 的漢譯史——爭論、接受與啟示》^⑪是近年來的代表作之一。

作為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God 的漢語譯名是基督教在華傳播史和聖經漢譯史上最核心的問題之一,眾多傳教士參與討論,不少中國人也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中,討論斷斷續續持續近三百年,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資料,其中蘊含著中西方宗教、文化、語言最深入的碰撞和交流,並再現了中西文化交

流的大型歷史場景。該著作從一個看似具體而微的研究對象為切入點鋪展開來，卻呈現出一個錯綜複雜、具有宏觀性的研究領域——對 God 漢譯討論歷史的梳理，分為明末清初、新教來華早期、1877 年新教傳教士大會前後和 1890 年新教傳教士大會前後四個討論比較集中的時期，為後續討論提供了一個歷時的視野。其次是截取 1875 年至 1877 年、1890 年至 20 世紀初兩個時段，以翻譯過程的構成要素為理論框架，詳細剖析《教務雜誌》所發表的譯名討論文章，總結出傳教士在四個方面的主要分歧：對原文理解的分歧，對譯入語理解的分歧，對當下讀者看法的差異，對譯者自身所處傳統的不同理解及個人取向的差異。在此基礎上，作者反思了可譯性問題、詮釋衝突問題和傳播中求同與求異的兩難問題，嘗試從傳教士的討論中尋找解決難題的方案。該研究除了呈現相對完整的接受史之外，也著重通過個案考察，凸顯接受者的主體性及其在不同歷史處境下的不同理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2. 基督教神學中國接受史的開拓

基督教神學(哲學)思想的中國接受史，是學術界引人關注的標誌性研究事件。之所以說“標誌性”事件，是因為在過去的研究中，中國和基督教思想世界之間似乎橫亘著一道城垣，學者的研究總是“笑問客從何處來”，而不探求“何以”是這位“客人”(基督教思想)以及客人的“人生”(基督教思想的研究)以及如何“待客”(基督教思想在中國的接受與理解)。如果用傳播學的話語就是：消息—媒介—受眾—傳播者—效果(拉斯韋爾五要素)的邏輯發展圖式，以此來解釋的話，中國傳統的基督教史研究更關注“受眾—傳播者—效果”而忽視了“消息—媒介—受眾”的前置環節，因而導致了基督教神學中國接受的理解的“似是而非”與莫衷一是。在這一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偉馳的工作可謂開拓性的。

在即將出版的關於奧古斯丁東傳的新作中，周偉馳強調，隨著天主教傳教士明末來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具有“異質性”的奧古斯丁哲學，也有了與中國人進行對話的真實可能性。第一代來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即已在著作中談到奧古斯丁。明清之際，奧古斯丁的形象出現於“聖人傳”當中，奧古斯丁的思想以語錄的形式流傳，影響到中國天主教信徒。晚清新教傳教士撰寫了現代意義的奧古斯丁傳記，並首次翻譯了《懺悔錄》。民國以後，中國新知識分子崛起，他們在教界之外譯介奧古斯丁，使奧古斯丁走出“教會”，進入“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奧古斯丁的介紹受意識形態影響較大，但在翻譯方面仍有成果。改革開放後，奧古斯丁翻譯和研究進入良性循環。新世紀以來，兩者皆呈現加速度發展的態勢。作者詳細梳理了奧古斯丁思想和學說在中國的譯介、流變、理解和研究的歷史，透過奧古斯丁思想漢傳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和區域、思想、教會等多方面的影響，做出了該如何理解、詮釋和運用奧古斯丁，以奧古斯丁來觀察中國思想，並在中國的思想脈絡中提出中國的問題，借鑑奧古斯丁予以解決，作為學術共同體起點的嘗試。

思想是“靈動”的，也是“靈氣”的，它們不僅僅是在傳播，也有與本土文化的交融。在這一領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張洪彬之《祛魅：天人感應、近代科學與晚清宇宙觀念的嬗變》¹² 值得關注。作者從思想史層面入手，審視晚清基督教自然神學及其中包含的近代科學知識對傳統宇宙觀的挑戰，並考察本土知識分子如何運用以生物進化論為基礎的天演論來回應挑戰，進而解釋傳統宇宙觀的祛魅和信仰傳統的正當性衰弱。

3. 宗教生活史研究正在異軍突起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劉清華的《皇城的天主教社區：北京北堂 1688-1827》¹³，係筆

者近年來所見之關於宗教生活史研究的力作。與過去研究 18~19 世紀中國天主教史以“禁教”為核心的傳統政教關係視野不同,該書從一幅珍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清中期北京天主教堂區節日慶典圖像出發,提出以宗教社會史的方法,透過社區宗教事實和實踐,來考察天主教社區的生存日常。以往對中國天主教社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鄉村地區,鮮有對城市宗教社區的長時段研究,這本著作可謂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凸顯了城市宗教社區在傳統社會中的獨特性。同時,作者也引出了以往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中被忽視的另一個突出問題——重視外國傳教士而忽略本土神職,並列專章討論了本土神職的國際培訓、本土培養以及該群體的重大意義。

簡言之,通過對歷史事件內外因素的縱向梳理,對宗教實踐諸多因素的橫向解析,對傳教與信教,網絡、組織、儀式與實踐的多層面考察,並結合教會、地方、宮廷等多語種一手史料的分析,從社會史的角度對宗教組織的日常實踐加以審視,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鴉片戰爭前夕天主教在中國政治與社會中的歷史常態。由此觀之,該著雖以北京北堂為中心,實則並非一個封閉的單向空間,作者以這一特殊場域為線索,將社區與城市、區域與全球加以綜合考察,此乃其用功之處。

以往國內宗教生活史的研究大都是圍繞過去傳統的套路,北京大學哲學系肖清和的《天會與吾黨——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體研究》^⑩則巧妙地選取了“天主教徒群體”這一新視角,採用理論分析、結合宏觀與細緻個案的綜合研究,對明末清初天主教進行比較全面的整體把握與重新梳理,探究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體之形成及其與中國社會之間的互動,闡明了明末到清初天主教徒群體交往與認同所發生的變化及其原因等重要議題,為考察明末清初天主教發展提供了嶄新的視野。

與之類似的是,過去關於中西文明衝突的研究也多聚焦於民間信仰或民間宗教與基督宗教,特別是天主教之間的糾葛纏繞,但兼具特色和開創性的文本也不斷湧現,如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黃薇的博士學位論文《勸說與規訓:基督教與近代上海社會風尚》描繪了從鴉片戰爭後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百多年間,處在中西文明衝突與交匯點的上海。在這一時期中,上海一直是西方在華傳教運動的中心,其社會生活的變遷受到了包括基督宗教文明在內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影響。該著作即以此為切入點,通過“勸說”和“規訓”兩個維度,探索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環境下在華基督教會與傳教士在社會生活領域中關注點的變遷,及其對上海社會風尚造成的影響。“勸說”是指通過運用各種策略,使被勸說者願意採用勸說者提出的意見或行為趨向。“規訓”則是一種“權力—知識”相結合的產物。在文化上的規訓,即通過文化風氣的薰陶、風俗習慣的養成,乃至意識形態的灌輸,從而將其納入與規訓者相同的文化語境中,減少“西方人”在殖民化過程中產生的衝突和摩擦。當艦炮和條約漸次退居幕後,上海城內的租界和西方人群體的活動如同一幅活動的“西洋景”,逐漸顛覆了傳統中國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各種各樣來自異質文化的習俗悄悄進入到普通民眾的生活當中去。作者依據傳教士出版的各種回憶錄、書信集、中外教會機構的檔案以及教會出版機構出版的大量圖書、期刊等中西文獻,探討社會風尚與基督教的互動關係,讓人視野一亮。

(二) 尊重歷史

1. 不約而同

儘管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時至今日,尚無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撰的規模宏大、理論豐富、體系完整的中國基督宗教通史著作問世。不過,在某些特定領域,這一局面正在發生令人欣喜的變化。伴隨著中梵關係出現的“改變”、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內冷外熱”以及眾多海外學成人士的各方面積累,近代中國天主教史尤其是中梵關係有了巨大的學術突破,比較有代表性的

重要著作有三部：

(1)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謝斯傑的《漫漫長路：羅馬教廷對中國的外交政策》。^⑤此書對於中國天主教史、特別是中梵關係研究做出了一個“銳利”的嘗試。作者系統梳理 19 世紀以來羅馬教廷與中國政府的歷次建交談判，考察了清末李鴻章主持下的建交通使談判；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陸徵祥所推動的建交談判；民國初期剛恒毅 (Celso Costantini) 來華後所主持的簽訂政教協定並互派使節的嘗試；1942 年重慶政府派遣謝壽康為首任駐教廷公使，並代表中國向教宗遞交國書，完成了單方面通使；1946 年教宗派遣黎培里 (Antonio Riberi) 來華等，重點闡述了建交進程中影響雙邊關係的內外因素、談判細節以及雙方關係的可能走向，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國際學術界在當代羅馬教廷與中國關係史研究領域的部分空白。特別是，作者很好地利用了 2020 年羅馬教廷最新開放的庇護十二世時期的檔案，在結合前賢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充分挖掘了羅馬教廷國務院檔案館的第一手文獻。

應該說，這部著作涵蓋了整個近代中國天主教史的時間脈絡，打破了以往以問題、事件、人物或衝突為主題的傳統研究模式，也更為準確地以中梵外交關係這一主線梳理了近代中國天主教歷史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比較“純正”的中梵關係史，或者在中國天主教史的脈絡中卻能盡量跳出上述傳統的不足。惜乎暫無中文版本的出版。

(2)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張銳的《教廷特使多羅與中梵早期關係 (1622-1742)》。^⑥如果說謝斯傑的著作嘗試補補了近代中國天主教“通史”的不足，並且從“純正”的教廷外交歷史出發的話，那麼張銳此書則以一種更“艱難”的方式，對更早時期的中梵關係做出了梳理，也構築了天主教中國行傳史的早期“軌跡”。該書聚焦於近代早期首位來華的教廷特使多羅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他於 1702 年離開羅馬，1705 年抵達北京，1710 年卒於澳門。教廷遣使旨在加強與中國的對話，推動雙邊關係的發展。但在中外關係史的研究版圖中，對這位教廷特使的認知仍比較有限。前人的研究大多基於某些天主教修會的文獻或少量清宮檔案，從第三方的角度進行敘述。該書的獨特之處在於直接從特使的書信手稿出發，揭示其內心世界，反映了教廷的關注焦點。全書以多羅八年的履職經歷 (1702-1710) 為考察線索，以羅馬教廷原始檔案為研究視野，重點考察了梵蒂岡圖書館、梵蒂岡秘密檔案館、傳信部檔案館、信仰教理部 (原“宗教裁判所”) 檔案館的第一手史料，梳理了教廷對華政策的演變路徑。該著作的另一特色在於整理和研究了 18 世紀教廷內部文獻《多羅樞機使團史》^⑦，該文獻編者為多羅特使在意大利的代辦 (Procuratore) 法蒂內利 (Giovanni Giacomo Fatellini)，重點陳述了多羅出使的前因後果，梳理了教廷與中國關係的歷史脈絡。由於其所包含的文獻數量巨大，語種多樣，除了 17~18 世紀晦澀難懂的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外，還有不少拉丁文手稿，讓人望而卻步。

(3)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劉國鵬的《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中國天主教會》。^⑧該書以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當代中國天主教為論域，點面結合，側重考察和反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天主教在中國化和大公性雙重維度和視域下的自身建構與路徑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全書在結構上共分為三個單元，總計五章：第一、二章構成一個單元，側重綜合觀察 1978~2012 年這一時段內中國天主教的實體發展與文化主體建設；第三、四章構成第二個單元，強調透過田野調研和實踐檢驗來剖析天主教中國化的現實性與差異性；第五章則獨立構成第三個單元，旨在以焦點透視的方式，探討中國天主教會在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自我調適與面臨的挑戰。該書試圖通過上述五章、三個單元，以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方式探討改革開放以來天主教中國化的普遍特徵與地方差異、共性與個性、理論探索與現實處境，進而探析改革開放以來天

主教中國化的探索與成就、機遇與挑戰，從而為理解當代中國天主教的基本特徵與內在邏輯提供一份具有導引性的闡釋和說明。該書為近年來較為系統地論述中國大陸當代天主教發展現狀的專業性著述，在某種意義上填補了國內在該領域的一大研究空白。該著作有關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當代天主教的理論梳理與實踐檢驗，外在聚焦和介入式觀察，多是採取宗教社會學的學術視角和方法，時間跨度則是從“改革開放”到 2018 年的 40 年，以期從整體到局部、從宏觀到微觀，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天主教會有一個全景和切片式的掃描和聚焦，尤其是對以往該領域專業學者較少涉足和總體研究不夠深入的某些區域和主題，如地方天主教會的現實存續與自我調適、政教關係中的政治認同、中國天主教會與包括海外教會在內的世界各地天主教會的交流與互動、中梵關係的近時段跟蹤與考察等，均試圖勾勒出一幅整全的、富有深度的動態化圖景。

此書和劉國鵬早前的成名之作《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¹⁹——以首任駐華宗座代表剛恒毅(Celso Costantini)在華教務活動(1922~1933)為經，以同時期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為緯，在充分利用教廷檔案的基礎上，以多語種文獻，多元研究視角為解讀進路，綜合、立體地勾勒了 20 世紀 20~30 年代中國天主教“本地化”運動的挑戰、問題和階段性成果——構成了“姊妹篇”。

有意思的是，如果從時間軸的角度看，上述三部著作，《漫漫長路：羅馬教廷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教廷特使多羅與中梵早期關係(1622-1742)》與《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中國天主教會》，加上《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巧妙而“默契”地構築了中國天主教的“通史”之論，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2. 蓄力待發

關於中國基督宗教通史著作的編撰工作，學者們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

新近出版的《中國基督宗教史(635—1949)：一種跨文化視野》²⁰，由上海大學文學院陶飛亞與香港聖公會魏克利(Philip Lauri Wickeri)共同主編，這是中西學者合作撰寫中國基督教史的一次嘗試。該書借鑑融合過往 30 年所湧現之中西研究方式及研究成果，作出新的探索和敘述。

周偉馳亦正在由太平天國研究而上溯至鴉片戰爭前的“南洋西學”，再下延至廣學會和民國脈絡，欲撰寫中國近代基督教思想史(1807~1949)，目前正補寫明清基督教思想史，以構成一部完整的四百年來知識觀念全球化中的中國基督教思想史。

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唐曉峰正在籌劃中國基督教通史的寫作工作，已發表了許多初步成果，並得到了積極的反饋和熱議。唐曉峰認為，宗教學界一般以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溫、明末清初天主教、1807 年以來的基督新教四個階段來劃分中國基督教史。這種劃分法既著眼於中國基督教縱向的歷史沿革，同時兼顧了各個階段基督教傳播的主要內容和重要特徵。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四階段劃分法潛在地割裂了中國基督教史的連續性，既成事實的分隔在中國基督教歷史著作中已經屢見不鮮²¹，這種缺憾在唐元之間中國基督教史的書寫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些觀點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討論。

3. 方興未艾

如果說中國基督宗教的歷史書寫正呈現出多元一體的“不謀而合”和群策群力的“蓄力待發”，那麼作為基督宗教史研究根基的中國基督教史料學與歷史文獻學的不斷融合，則為中國基督教史的未來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歷史文獻學和中國基督教史的“聯姻”——運用歷史文獻學的方法、以歷史文獻學的視角開展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正方興未艾。

眾所周知，漢語天主教書籍不僅是明末清初產生的新文獻群，在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中國基督宗教史等學術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價值。其中,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毛瑞方在《漢語天主教文獻目錄編纂史概述——以教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考察》²²一文中以明清漢語天主教文獻目錄為研究對象,以綜合目錄和專題目錄兩種類型的橫向標準和各部時間先後的縱向標準,立體呈現了從晚明至今的一些中、西文目錄收錄明清漢語天主教書籍的情況。此外,還有一批學者在梳理和總結中國古籍目錄對明清漢語天主教書籍的著錄情況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恕不一一羅列,但意義不言而喻。可以說,將明清時期的這批文獻統稱為“明清漢語天主教書籍”,重設其廣義內涵並探研其各個時期的歸類特點及原因,是呈現宗教與學術、文獻與文化互動過程的又一個典型案例,可以從中挖掘不同學術領域有價值的文獻內容,亦可通過不同時期的古籍目錄對明清漢語天主教書籍的著錄情況及特點,反觀不同時期歷史、文化、學術、政治、經濟等狀況。這是一個全新的視角,為中國古代史、基督宗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增添了歷史文獻學的學理支撐。

(三) 尊重現實

1. 實證空間的打開

區域基督宗教史研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可能性,很多論題獨具慧眼,並注重將基督教傳播與地方政治、經濟、文化變遷深度融合。其中,最為可觀的當屬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徐炳三的《“扭曲”的十字架——偽滿洲國基督教研究》²³、《近代中國東北基督新教研究(1867-1931)》²⁴以及山東大學歷史學院胡衛清的《近代中國教會的自立——以潮惠長老會為個案(1881-1949)》²⁵等著作。

《“扭曲”的十字架——偽滿洲國基督教研究》以東北淪陷時期的基督教為研究對象,對這一時期東北基督教會的境遇、變遷、發展和衰落進行探討,旨在通過宗教社會史的研究路徑,推動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同時,以偽滿洲國基督教為個案,探討淪陷區政教協同體系的建構過程和形成機制,揭示日本本土的宗教政策和政教關係對淪陷區宗教及社會的影響,分析日本宗教組織在淪陷區宗教控制和社會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以大量扎實的史料,回答了偽滿洲國基督教與中國和世界政治的關係這一高度敏感且具有挑戰性的話題。《近代中國東北基督新教研究(1867-1931)》則以東北社會變遷和政局變動為背景,以東北基督教會在不同時期的處境、對政治問題的回應以及這種互動對教會發展的影響為主線,揭示近代東北教會這樣一個特殊的組織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關聯及影響政教關係的種種因素,進而揭示在政治影響下信徒群體之間、教會宗派之間、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從而在一個更為宏大的社會背景下探討中國東北教會的境遇和特點。

胡衛清則關注到教會自養問題。他以潮惠長老會為個案,指出在教會的早期自立運動中,經濟上的自養被認為是教會能否實現自立的前提——潮汕地區長老會的自養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已經達到了什麼水平?是什麼因素制約了教會的自養?自養與自治和自傳的關聯性何在?其次是自治;第三是差會因素與民族主義。作者借鑑社會經濟史、宗族史、華僑史的研究方法,盡可能對與自立運動相關的要素進行量化分析,同時對自立運動的內部動因進行解釋,希望以此勾勒出本土教會成長的大致軌跡,同時,為避免在研究中“只見機構不見人”的弊端,作者不避煩瑣,力圖對相關人物的活動進行細緻梳理,以展現教會自立運動本身豐富的內蘊。

當然,這裡只是掛一漏萬,在區域(地方)基督宗教史研究蓬勃發展的21世紀,佳作不斷誕生,如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吳義雄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1807-1851》²⁶、暨南大學文學院吳青的《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²⁷等。目前全國各地都由學者編寫當地的基督宗教歷史,頗為可期。總體而言,區域研究,正在成為中外學者都下力氣

開拓的一個並不“煥然”但卻“一新”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熱點。對於這一成因，有幾個方面的因素：

(1) 材料，材料，都是新材料

徐炳三指出，研究區域或地方基督教史的有利和不利條件均是史料。由於區域(地方)的歷史因素，中外文基督教檔案、地方文獻、個人回憶、書札信件、野史軼聞甚至口口相傳，凡此種種，都為區域(地方)基督教史研究提供了多元豐富和相互佐證、質疑與反思的多維視角與材料“供給”。

很多學者通過全面爬梳和深度研讀中外文基督教檔案，扎實掌握了基本史實；同時也嘗試跳出教會史料，從地方文獻入手，以避免史實同質化；深入研讀基督教檔案，尤其是外文差會檔案，是開展基督教區域史研究最基礎的工作。必須要確保史實足夠清晰、內容足夠細緻、問題足夠明確，才能為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然而，差會檔案往往存在千篇一律的缺點，即各個差會在各地的傳教記錄大同小異。雖然不同地區的記載一定有差異，但共性還是主要的，僅憑檔案本身書寫的不同地區的基督教區域史，往往存在嚴重的同質化傾向，從而抹殺了區域特色。同時，通過這種方式做出來的成果，研究框架也高度相似，很難找到突破點。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必要跳出教會看教會，先廣泛研讀大量地方文獻，考察教會與社會之間可能的關聯，進而再結合教會史料做研究。

(2) 區域(地方)與世界

徐炳三認為，基督教區域史研究須觀照基督教發展全域，體現局部與整體的相互關聯；同時應與其它地區作適度比較，以凸顯地方特色。基督教在地方社會的傳播並非孤立的，它有其西方源頭，同時在中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均有傳播，故而考鏡源流、觀照整體基督教史至關重要。中國基督教史是世界基督教史的一部分，中國區域基督教史是中國基督教史的一部分，不同局部共同構成了整體，但整體又統攝了局部的演進，兩者是辯證的關係。從局部觀照整體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地方的問題，但並不意味著地方基督教史必須寫成整體史的縮小版，這反而是我們要極力避免的。

此外，將某地區的基督教史與其它地區比較也至關重要，尤其是同一教派在不同地區的傳播，這是體現區域特色的關鍵。放大來看，中國基督教史也應與其它國家作比較，中國學者除了與日本、韓國等少數國家基督教史有所參照外，其它地區幾近空白，或為日後努力的方向。即便開展單一教派在某一區域內的研究，也要觀照不同教派之間的關聯和對比，同時要考察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關係的演變。

近代中國各地往往有多個基督教宗派傳播，它們劃區而治，在和諧相處的大氛圍下也存在相互競爭，尤其是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特別明顯。不同教派在同一個社會環境下傳播，若存在傳教策略和效果的差異，則可以凸顯各自的特色。傳教士和基督徒是基督教組織的兩大主體，講述兩者的故事、考察雙方關係的演變是基督教區域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它反映了地方教會權力格局的此消彼長和變化。中國基督徒群體值得重點探討，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與非信徒的關係、行為習慣、心路歷程、自我調適等等，均可以呈現基督教區域史的多重面向，豐富相關研究的細節。

(3) 現場猶在

同時，區域(地方)基督教史研究的“勃興”與田野調查及口述訪談的“便利”不無關係。前文提到的“口口相傳”的歷史傳說、家族回憶、集體記憶和個體經歷等，都是基督教區域史研究的重要輔助手段，有助於史料的獲取和增加歷史現場感——特別是對於很多歷史尚未遠離的情境來說——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往往會給基督教區域史研究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依然有可能從某些基督徒的後人那裡淘到獨特史料。

2. 理論空間的嘗試

關於“宗教中國化”、“基督教中國化”認知問題的討論，其內涵與外延不斷拓展。近年來，“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廣受海內外學界關注，卓新平、張志剛、唐曉峰、游斌等學者都致力於探討、構建和豐富基督教中國化的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徑。這當中，我要特別提及吳青在其最新的一篇論文中嘗試論述“基督教中國化在香港”這一問題。^②

吳青認為，基督教中國化在香港的演化過程，對香港社會具有重要意義。自 20 世紀初起，面對中國社會的劇變以及悠久的中華文化傳統，香港聖公會何明華 (Ronald Owen Hall) 與白約翰 (John Gilbert Hindley Baker) 兩任會督在中國社會政治處境中，理解中國精神與品格，將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相結合。他們不僅主張中文教育、重用華人牧師，而且對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給予新的闡釋，使基督精神與中國社會得以和諧融合。基督教中國化不僅發生在當代，而且從西方傳教士踏上中國土地就開始了，他們學中文，用漢語書寫，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解釋基督教義，這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開始。因此，基督教中國化必需具備三個要素：說漢語、用中文書寫、以中國人為主體。同時，在空間建構上，中國化不僅是中國內地基督教的本地化，也是超越地理的一種文化、政治表達與訴求。以香港為例，香港基督教並不是基督教中國化的孤島，恰恰是基督教中國化最具國際特色和中國風格的融合體。故此，基督教的中國化，最終解決的是基督教與中國人的關係。基督教中國化，不只是中國人參與的基督教中國化，也包含歷史上所有為基督教中國化貢獻生命與智慧的人士，包括西方人在內。他們理應是基督教中國化的一部分，這也是全球史視野中基督教中國化的應有之義。

四、結語

巧合的是，整整 20 年前，孫尚揚與鍾鳴旦合著的《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提到，在過去 25 年中，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研究發生了重要的範式變換。一般說來，這一變換是從傳教學和歐洲中心論的範式轉到漢學和中國中心論的範式。^③

20 年後，筆者以為，孫尚揚與鍾鳴旦所言的範式轉換仍然在進行中，但伴隨著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內在覺醒”，這一範式的轉移正在從“傳教學和歐洲中心論的範式轉到漢學和中國中心論”、從對於“什麼樣的模式來闡釋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文化交流的模式，中國現代化進程因素模式，抑或是邊緣宗教模式，開化方案模式，還是自我與他者模式”^④的討論，進而步入到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自身內核與外延的自我認知、自我定位與自我反思。這三個轉換之間絕非矛盾，而是事物螺旋發展辯證統一的必然路徑與自身訴求。讓信仰的歸於信仰，讓學術的回歸學術，讓“歷史”展現歷史——彼此必然交匯、互補，卻也涇渭分明，前提是，我們承認宗教在社會發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如此，尊重信仰、尊重歷史、尊重現實，作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支點，在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本來的面目努力之上再生繁花，或能指日可待。

①丁光訓：《關於我國的神學教育——為一次會議準備的發言》，南京：《金陵神學志》，2022 年第 2 期。

②⑥⑦⑧陶飛亞：《邊緣的歷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307、318 頁；第 318 頁；第 317~318 頁；第 318 頁。

③關於中國基督教史學科性的研究和討論頗多，因本文的重點在於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者的突破，故在此不做更為繁瑣的文獻梳理與分析，直陳問題的答案，特此說明。

④轉引自唐曉峰：《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及研

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220~221頁。

⑤丁光訓的這番話雖然是說給教會內部的，但其對於學術研究和信仰研究的邊界與融合問題的分析，值得我們注意。

⑨感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徐以驊《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漫談》（“交互與轉折：1920年代與基督教中國化”開幕式特邀發言稿，上海大學，2022年12月24日）以及陶飛亞、楊衛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0年第10期）。

⑩本文僅基於作者個人的學術理念展開，並非學術綜述或概論，故不會面面俱到，疏漏在所難免，尚祈讀者理解。

⑪程小娟：《God的漢譯史——爭論、接受與啟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⑫張洪彬：《祛魅：天人感應、近代科學與晚清宇宙觀念的嬗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⑬Qinghua Liu, *Une paroisse à la Cité impériale: Le Beitang de Pékin, 1688-1827*,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2021.

⑭肖清和：《天會與吾黨——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體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⑮Sijie Xie, *Un lungo cammino: prodromi ed esiti della politica diplomatica tra Santa Sede e Cina*, Edizioni Nuova Cultura, Roma, 2022.

⑯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⑰Istoria della spedizione del Cardinale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這是一部至今尚未完整公開的手稿，現存於羅馬卡薩納塔圖書館。

⑱劉國鵬：《中國化與大公性雙重張力下的中國天主教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

⑲劉國鵬：《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⑳陶飛亞、魏克利 (Philip Lauri Wickeri) 主編：《中國基督宗教史 (635—1949)：一種跨文化視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

㉑唐曉峰：《唐元間基督教史述評——兼論早期中國基督教史的連續性》，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8期。

㉒毛瑞方：《漢語天主教文獻目錄編纂史概述——以教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3期。

㉓徐炳三：《“扭曲的”十字架——偽滿洲國基督教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

㉔徐炳三：《近代中國東北基督新教研究 (1867-1931)》，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

㉕胡衛清：《近代中國教會的自立——以潮惠長老會為個案 (1881-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3年。

㉖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1807-1851》，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㉗吳青：《何明華與中國關係之研究 (1922-1966)》，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㉘吳青：《20世紀香港基督教中國化的探索——以香港聖公會兩任會督為中心》，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5期。

㉙㉚孫尚揚、鍾鳴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2頁；第1頁。

作者簡介：袁朝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732

[責任編輯 陳志雄]